

### 三、经济安定九原则与道奇路线

#### 1. 匆忙的“稳定政策”

随着美苏关系的恶化，美国进行了所谓“占领政策的改变”，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由此得到加强，首先以重点生产方式揭开了“重新生产”的序幕，接着便走上了扩大再生产的轨道。

但是在这期间，在马歇尔计划支持下，西德及其他欧洲各国都迅速地取得了恢复经济的成果，因而这些国家在恢复生产和发展贸易上都比日本抢先走了一步，并成功地阻止了通货膨胀的急剧发展。美国乃急于缔结 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早日巩固在军事上可以对抗苏联的西欧阵营。当时在亚洲，中国解放军以破竹之势打败蒋介石军队，并席卷整个中国，这对美国来说也是它自己的惨痛的败北。尤其是 1948 年 9 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告成立，朝鲜半岛的政治形势又使美国陷入了日益加剧的不安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环球策略的一环，美国企图迅速将占领下的日本变为自己在亚洲最重要的坚固据点，使其成为反共基地，以对抗亚洲大陆上突然崛起的共产势力，阻止其扩大发展，并将其消灭掉。这种企图虽然在外观上与美国垄断资本将日本培育成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的意愿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统一的。这一点，美国陆军部长路易亚尔在 1948 年初的声明中已经和盘托出，他说：为把日本变成防御共产主义威胁的干城，必须促进并支持日本经济的稳定和独立。

日本经济要在稳定的基础上谋求独立，已经成为美国的国策。

1948年春，以调查团团长身份访问日本的美军前陆军部副部长杜勒帕曾经向芦田首相强调平衡预算收支的重要性，指出这是谋求经济独立的必要条件。同杜勒帕一道来日的美国陆军部约翰斯顿委员会在其报告书中（也称做杜勒帕报告书）明确指出，当时日本已经具有达到预算平衡的条件。为进一步推行美国政府支持日本发展经济的方针，1948年7月，总司令部指示日本政府公布了“稳定经济的十项原则”。

在这前后，作为收缩通货膨胀或稳定经济的对策，日本国内有过以吸收外汇为内容的“中间稳定”的设想，政府和中央银行也为此制订过试验性的方案。从战争结束到这段时间，在如何重建日本经济的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稳定是复兴的必要条件，必须首先制止通货膨胀；一种意见则认为没有复兴便没有稳定，首先扩大生产才是重建经济的道路，实际上这是赞成通货膨胀的论点。正如当时大内兵卫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所谓中间稳定论，就是这两种观点的折衷，亦即一边复兴一边逐渐求得稳定发展的观点。但是，使急剧发展的通货膨胀缓慢地平息下来，逐渐达到经济稳定发展的看法，只是一厢情愿，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实际上，由于单一汇率制度的实行比预计的时间要早，上述设想便立即化为泡影。

另外，美国经济在1948年10月和11月达到高涨后便走向恶化。这是美国的战后危机，很多人认为它反映了战争结束的后果。它迫使美国政府尽量削弱对日援助，因而美国更加强烈地希望日本尽早实现经济独立。亚洲形势日益不利于美国，也使其增加了紧迫感。从另一方面看，日本政府虽然提出了“十项原则”，但对于收缩通货膨胀、提早实现经济稳定等等，并未做出认真的努力。美国政府从日本的生产及其它经济的恢复情况上，也看出了日本垄断资本那种相当顽固的态度，于是美国政府和占领军当局断然

站在前台（据当时安定本部副长官说，美方采取如此强硬的形式，是美国对日本政治力量不满的表现），采取不通过日本政府而以美国政府直接指令的形式，于1948年12月18日由总司令部公布了所谓“稳定经济九项原则”。

“九项原则”的内容可简单列举如下：（1）实行平衡预算；（2）改革税制；（3）限制信贷；（4）稳定工资；（5）扩大、加强价格统制；（6）改善外贸管理方式；（7）对出口工业的原料供应实行重点分配；（8）增加国产原料和工业品的生产；（9）提高粮食征集工作效率。以上列举的原则都是抽象的词句，从中很难了解具体执行时不断出现的重大问题。这九项原则的内容同“十项原则”几乎没有区别，最大的不同而且意义也极为重要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新增加了提早实施单一汇率制度。为了提早实施单一汇率，就必须贯彻执行与九项原则有关的计划。所以麦克阿瑟元帅在给吉田首相的“书简”中，以极其强硬的态度和严厉的措词，要求日本贯彻执行九项原则。他要求接受美国援助的日本人民在各方面忍受困苦，甚至暂时放弃“自由社会”所承认的一部分自由和权利，绝对不允许并严格取缔有碍九项原则和旨在反对九项原则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并认为这是提供援助的国家的当然权利。

组阁时间很短而且处于少数党地位的第二次吉田内阁，看到自己没有力量来镇压在各阶层中可能掀起的反抗运动，便在占领军的暗中指导下解散国会，举行了总选举，这才使民主自由党在众议院里获得了绝对多数，组成了第三次吉田内阁，从而为九项原则的实施一一做了安排。

## 2. 道奇路线的目的与计划

约瑟夫·道奇以公使资格，作为麦克阿瑟的财政经济顾问，于1949年2月初到达东京，立即以他为中心制定了执行九项原则的

具体方案。道奇是美国底特律银行总经理，他在美国占领下的西德取得了指导制定财经政策的实际经验。他的方案以及在他领导下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通称为道奇路线。

在社会党两次组阁失败之后，在中国解放军取得辉煌胜利的形势下举行的总选举，使共产党人大举进入国会，它的候选人有三十五人当选。所以吉田首相在组阁后的第一次讲话中特别提出反共策略，强调以稳定国民生活作为根本对策，而以停止通货膨胀作为稳定国民生活的先决条件。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态度更为彻底，道奇路线的根本任务就是全力以赴地稳定经济。与道奇一起再次来日的路易亚尔陆军部长在谈话中公开表示，只有建立健全的经济，才能对抗共产党的扩张；建立健全的经济，是美国占领政策的基点。道奇也就这一点作过极其扼要的发言，他在美国下院作证时说，与经济稳定有关的真正问题，是人们对政治和社会的反应。当时日本的重要问题，是保证政治和工资的稳定，维持一种能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的较高的生活水平，为此必须提高实际工资，重要的是提高货币的购买力，归根结底是提高粮食配额和棉制品的销售量。从最后一点看，可以说他对一个国家如何全面扩大利润和扩大资本积累的基本方法，是颇有体会的。总之，非常明显，解决与日本国内外共产主义势力相抗衡的问题，是道奇路线的根本和中心。如上所述，他是以自己的方法来对付共产主义势力的，当时他提出的目标是加强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其中心目的却在于反对共产主义势力。

上面概述了道奇路线最重要的目标，以下再说一下这条路线的具体内容、结构和概略。

道奇认为，为了复兴日本，首先必须稳定经济和收缩通货膨胀。道奇路线对付通货膨胀的策略是采取所谓“一劳永逸”的方式。他在自己的声明中这样说道：“夸耀生产指数提高和出口增加

是愚蠢透顶的行为，因为实际上这不过是美国的援助资金、（日本国家财政的）补助金和赤字扩大的表现而已。”他还作过一个当时很有名的比喻，他说：“日本经济好象骑在竹马上一样，竹马的一条腿是美国援助，另一条腿则是国内的资金补助机构。把竹马的腿弄得过长，就有摔倒而将脖子折断的危险，现在必须迅速把马腿缩短。”

第3表 租税及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战后道奇路线时期和战前的对比

（单位：亿日元）

年 度	国 税	地 方 税	合 计	国民收入
1934—1936年度	12 (8.5)	6 (4.5)	17 (13.0)	144 (100.0)
1940年度	375 (10.4)	37 (1.0)	412 (11.4)	3,609 (100.0)
1947年度	1,892 (19.5)	202 (2.1)	2,093 (21.6)	9,680 (100.0)
1948年度	4,460 (22.7)	777 (4.0)	5,237 (26.7)	19,616 (100.0)
1949年度	6,361 (23.2)	1,424 (5.2)	7,785 (28.5)	27,373 (100.0)
1950年度	5,702 (17.0)	1,883 (5.6)	7,585 (22.6)	33,610 (100.0)

（备考） 根据经济企划厅编《战后经济史（财政金融篇）》第123页。括号内数字是对国民收入的%。

**制定平衡的预算** 制定平衡的预算是“九项原则”的第一个重要要求，道奇认为这是在稳固的基础上重建日本经济的根本条件，他责备日本人对这一点认识不足和漫不经心。1948年度的预算只是在一般会计<sup>①</sup>上采取收支平衡的形式，而在特别会计上则是庞大的赤字，因此该年的全部预算赤字高达一千五百亿日元。与此相反，由道奇制订的1949年度预算，包括一般会计与特别会计在内，不仅综合平衡没有赤字，而且还有二千五百七十七亿日元的巨额盈余（相当于岁出总计一千八百亿日元的14%）。这样，道奇预

① 一般会计(general account)是日本政府最基本的会计，它以租税收入、发行国债作为收入的财源，为推动一般行政工作(如教育、外交、国防等)而提供经费。——译者

算已经越出平衡的范围,成为超平衡的预算。与上一年度比较,一般会计的岁出有大幅度的增加,与此相适应,岁入也有大幅度的增加,租税收入比上年一举增加近50%,因此国民收入中的租税比率(国税总额+地方税总额/国民收入)创战后最高记录,据政府公布为28.5%,比战前1934—1936年的平均比率13.0%增加了一点二倍,这是惊人的高比率(参阅第3表)。由于道奇路线征收了远远超过战时的重税,低收入阶层平添了难以忍受的负担。

另一方面,二千五百七十七亿日元的剩余资金,既可由国家用来偿还债务,使通货膨胀得到收缩;又为金融机关增加了头寸,使其在有利条件下为垄断资本等提供资金。总之,通过政府清偿债务,既然住了通货膨胀,又促进了资本积累。但是教育、文化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预算却蒙受牺牲,被大量削减。如上所述,大幅度地增加国税,是与民主自由党竞选时所许诺的减税大相径庭的。不仅如此,根据九项原则,为了改革税制和加强课税,日本政府还根据总司令部的命令创设了国税厅。随后,夏伍普税制调查团于1949年5月来日,协助改革税制。夏伍普方案从根本上说就是九项原则在税制方面的具体体现。但是,银行家道奇与大学教授夏伍普之间在资本积累的方式上存在着若干不同的意见。道奇主张尽量多收租税,以偿还国债(公债等)和充实银行的资力。总之,他是以增税和加强银行为中心来进行资本积累的,是银行中心主义。与此相反,夏伍普则主张以减税的方法来减轻个人、企业、特别是大资本家的租税负担,以促进资本积累。当时虽然根据夏伍普的方案进行了税制改革,但由于有各种反对意见,他的方案并未得到全面贯彻。因此大幅度减税的税制改革,从1950年度开始执行的情况来看,虽然减少了一些税务负担,但结果还是沿着道奇的路线,只是减轻了大资本家的负担,而中小企业和人民群众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所以整个国税的减少额比预料的

要少得多。在地方税方面，也是在建立地方财政的名义下加重了低收入阶层的负担。进入 1950 年度后，由于在岁出方面大幅度地削减了价格补差的资助，在岁入方面通过税制改革实行减税等原因，国家预算的规模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但是整个预算仍与上年度一样有很大的盈余，可用作偿还债务的资金。因此这个预算依然是超平衡的预算。

此外，复兴金融金库从 1949 年度起完全停止贷款，同时开始回收过去的信贷，这也消除了通货膨胀急剧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但是复兴金融金库自身的债务，作为政府债务的一部分，也要在 1949 年度内大量偿还。

单一汇率的设定 其次，必须提到的是单一汇率的设定，其意义之大，决不次于超平衡预算的制订。提早实施单一汇率对于执行九项原则的作用前面已有叙述。此外，单一汇率制还有其本身更为重要的意义。不设定单一的汇率，日本经济、日本商品和资本市场，便不能与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和市场建立真正的联系，商品和资本的进出口也就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仅不能称为一个出色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战后变化很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要想得到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现实上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绝、在温室中培养起来的日本工业经济，一旦被抛露在冷空气之中是否能够站住也是问题，因此日本极力把这个单一汇率订得很低，尽量使日元处于疲弱地位。这样一来，国内的通货膨胀非但无法控制，反而会急剧发展，所以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提高汇率，使日元过多地升值，出口贸易就要发生困难，而且这样一来进口货物价格就要降低，为了竞争，国内制品的价格也必须下降，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经济破产，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制止通货膨胀，保持通货稳定，这在当时无论如何也是必要的，但是一个中心的问题是，既能防止通货膨

胀又能刺激企业促进生产的单一汇率，究竟应该维持在怎样的高度上。

结果是，美军总司令部于1949年4月23日突然指示日本政府，从4月25日开始实行一美元兑换三百六十日元的官方汇率。一美元等于三百六十日元的汇率，与通常以战前为基期的1949年的日美两国的物价水平对比，大体相当，但这一日元汇价比一般预计的幅度三百二十日元至三百六十日元偏低一些，对出口工业的打击多少有一些缓和，而自行车、金属餐具、陶瓷器、船舶等范围相当广泛的商品的出口则可能因此陷入困境。面向国内市场的商品，也因废除价格补助制度，在与价格较低的进口商品的竞争中会发生相当的困难。

一美元兑换三百六十日元，作为单一汇率还有其划时期的意义。这就是它使日本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联系起来，特别是加强了与美元的联系，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战后以来日本对美国资本主义的从属关系，并为将来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加深打下了基础。

对外贸易方式这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外贸易几乎完全处于停顿状态，但在一笔笔具体贸易都必须取得总司令部批准这种严格的监督之下，国营贸易开始稍有增加。从1947年8月开始，部分地准许进行没有自主权的所谓“有限制的民间贸易”。随着道奇路线的实施，通常形式的贸易有所恢复，民间贸易范围逐渐扩大，出口从1949年12月开始、进口从1950年1月开始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但是当时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商社势力比日本商社强大得多。

**回头资金的设置** 与编制超平衡预算和设立单一汇率平行，作为道奇路线的另一翼，还设置了美国对日援助物资回头资金。资金的使用置于占领军最高司令官的管理之下。这也是意义很大



的措施。

前边已经提到，道奇在声明中曾经主张迅速削减美国援助和国内补助金。实际上，这种制度是早应废除的。在1949年度的预算中，补助金的金额至少比上一年增加近一倍，占岁出总额的30%；同样，对日援助也在继续增加，由日历年1948年的四亿六千万美元增加到1949年的五亿三千四百万美元（经济复兴计划委员会资料）。现在不仅要改进处理援助物资上那些暧昧和不完备的手续，据美国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有效地使用这种援助出发，设立回头资金制度。这种制度，就是要求日本政府将贩卖美援物资收到的货款存于特别会计账户，亦即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冻结起来，置于占领军的管理之下。日本政府只有取得总司令部的同意，才能一笔一笔地使用这批资金，并且限定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和用作重建经济的直接投资。从实际使用情况看，由1949年度到1951年度支出总数三千一百六十五亿日元中，偿还政府债务和购置公债占34%，对公私企业的投资占65%（参阅第4表）。

美援物资的回头资金，通过偿还政府债务和购买公债，在收缩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很大效果。同时，通过购买和偿还金融机关的公债，不仅大大加强了大银行及其它金融机关的资力，大大提高了金融机关的地位及其统制力量，也使有关产业的垄断资本得到了加强。在这三年当中，以美援物资回头资金对企业进行的直接投资中，私人企业占55%，政府企业占45%；在私人企业中，电力和海运方面占大部分，在政府企业中，铁路，电报电话、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以及住宅金融金库等政府金融机关也占了大部分（参阅第4表）。基础工业部门的垄断资本，多数都掌握着日本的经济命脉，因此将回头资金用于复活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从美国或占领军的立场来看乃是正当和必要的投资，从美国的军事立场来看，也是必要的。

### 第4表 回头资金支付实况

(1948年度—1951年度)

开支总额及其内容			政府企业投资		
	亿日元	%		亿日元	%
支付总额	3,165	100.0	政府企业投资总额	884	100.0
1. 偿还债务	1,118	35.4	1. 公共事业	109	12.4
购买国债			2. 国营事业	460	52.1
2. 公私企业投资	1,951	61.6	a. 电报电话	240	27.2
a. 政府企业	884	27.9	b. 国营铁道	190	21.5
b. 私人企业	1,067	33.7	c. 国有林野	30	3.4
3. 其它	94	3.0	3. 政府金融机关	315	35.5
私人企业投资的内容			a. 开发银行	100	11.3
私人企业投资总额	1,067	100.0	b. 输出银行	75	8.5
1. 电力	432	40.6	c. 住宅金融公库	100	11.3
2. 海运	427	40.0	d. 农林渔业金融公库	40	4.5
3. 煤炭	64	6.0			
4. 钢铁	22	2.1			
5. 其它产业	35	3.2			
6. 中小企业	34	3.2			
7. 其它	52	4.9			

(备考) 据大藏省理财局回头资金科编《回头资金记录》制成。

1949年以来的三年期间,日本私人产业从外部筹措的设备资金中,财政资金比率最大,占37%,而财政资金中的70%(占全部外部资金的26%)是回头资金。特别是在1949年和1950年上半年金融紧缩的情况下,回头资金的比重如此之大,对产业的发展动向,无疑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美援物资的回头资金在推行道奇路线过程中,发挥了作为控制财政、金融、工业等有力手段的机能。此外,回头资金有时还被总司令部用作迫使政府对美国俯首贴耳的手段。这里有例为证。战时为了由国家管理电力,成立了日本发电送电公司(简称“日发”),战后根据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决定解散“日发”。后来将解散“日发”作为电力事业改组交给新设的公益事业委员会来

进行，但由于总司令部在改组的方针上与日本垄断资本的根本想法不一致，以致电力事业改组委员会内部分歧很大。后来按照总司令部的方针，将“日发”分割为九家，但因国内各方继续激烈反对，此案终于在国会上遭到否决。于是总司令部不得不在1950年11月作为波茨坦政令发布指示，解散“日发”的方案才勉强通过。当时，总司令部已明确表示，如果解散“日发”方案继续遭到反对以致电力事业的改组推迟，就以停止为电力事业提供美援物资的回头资金来施加压力。

设立回头资金后，美国对日的物资援助仍以粮食为主，其它还有石油、医疗品、棉花等。这种以剩余农产品和过剩商品为主的物资“援助”，首先是表示美国对日本的恩赐，然后在日本国内抛售这些剩余物资，再以抛售的收入作为道奇路线下的调整资金来使用，有时作为必要的压力手段来利用。因此回头资金的设置，对美国来说真是效率极高而妙味无穷的方策。

### 3. 道奇路线执行经过与结果

道奇路线是道奇于1949年2月到任时开始制订的。道奇路线开始执行时就出现了迟发或欠发工资的问题，全国私人工业裁减人员的现象不断增多。从1948年末开始，中、小企业破产现象也进一步扩大了。4月以后，随着超平衡预算的实施、单一汇率的设立、美援物资回头资金的设置，道奇路线正式形成。这时货币流通额的增长趋于停滞，通货膨胀暂告平息（参阅第5表）。但是，阶级对立却大大加深了。

道奇路线的实施，采取了所谓通货紧缩政策（即在不减少生产和就业的情况下收缩通货），对于来自财政方面的紧缩的影响，则由金融机关积极提供贷款来消除，这就是以缓和金融的方法来维持生产的上升，同时压缩国内的购买力，尽可能将商品用于出口。

第5表 战后日本银行券的膨胀及道奇路线加以制止的情况

日本银行券流通额		日本银行券流通额指数(战争结束时流通额=1)
	100万日元	
1945年末	55,440	1.9
1946年末	93,397	3.2
1947年末	219,141	7.5
1948年末	355,280	12.1
1949年末	355,311	12.1

(备考) 据日本中央银行《本邦经济统计》，指数是著者计算的。

然而在执行这个路线的初期，美援物资的回头资金的运用投资方面没有进展，因而银根比较吃紧。出口贸易也因美国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而困难重重。工矿业生产虽然没有下降或者呈停滞而略有上升的趋势，但消费却停滞不前而且趋于下降，因而存货剧增。于是银行大力增加库存贷款，使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迅速扩大，一时出现银行贷款过多的状况。

尽管如此，大多数中、小企业并没有得到贷款，加以课征重税和撤消经济统制，需求和订单减少，因此中、小企业破产和合并现象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大幅度全面下跌，黑市价格也明显降低，但由于废除价格补差，政府的牌价上升，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由于生活费用提高、税收增加、劳动强度加强以及失业等原因，工人阶级承受极大的负担。被解雇的工人数目，在1949年一年中估计近百万人。尽管不少大资本家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打击，但与中小企业相比，一般地说没有问题，而且有实力的企业还相当稳定，特别是金融机构，在道奇路线下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1949年秋后，由于美援物资回头资金的投放和增加滞货贷款，形势有所缓和。但是9月份英镑突然贬值30%，日本的出口更加困难了。另一方面，与英镑贬值相同，日元汇价也发生了预期的下降。于是反对道奇路线的空气一度高涨起来，政府也开始考虑改

变政策的问题。尽管国际经济形势已经出现好转，但日本经济状况一直到1950年也未见改善，而且美国政府和道奇不仅不缓和道奇路线，甚至表明了坚持的方针。到5月份时，日本中央银行和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金融的方针，于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就要爆发了。正当此时，6月25日突然爆发了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事态遂为之一变。虽然已经处于道奇路线所造成的危机前夕，但并未发展成为真正的危机。从表面上看来，这场危机只是一种特殊的萧条而已。

#### 4. 国家统制的急剧缩小

由战时到战后初期这段时间，全部经济还是处于国家的严格统制之下。国家对经济的直接统制虽然从“九一八事变”时便已开始，但是真正的统制经济还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事情。“七七事变”一发生，日本就制定了各种重要的经济法规，第二年即1938年便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这项法令既是战时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基础，又使国家对经济的直接统制急剧扩大与强化。所以从战时到战后，在国家统制下，日本的经济活动和国民生活都被捆得死死的了。

如上所述，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曾一度倾向于废除国家统制，但在物资奇缺、极端贫困而混乱的情况下，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只能火上加油。于是很快又回到老路上去，国家总动员法在1946年失去效力之后，政府就公布了新的临时物资供应调整法，以此为基础，才废除了国家直接统制经济的战时方式，采取了以经济安定本部（经济企划厅的前身）为最高经济机关的战后新方式。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加强了对生产、分配和价格等的统制。在1947年的社会党内阁时期，又成立了由政府一手收购和贩卖煤炭、石油、肥料、粮食和酒类等的一系列分配机构和其它各种分配机构。

特别是1948年末颁布的“九项原则”中提出要加强物价统制，必要时还将扩大统制范围，以及加强粮食的集中管理等等，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统制，并没有迅速缓和或撤消这种统制的迹象。但是进入道奇路线时期以后，大幅度削减价格差额补助以及将控制经济的中心由财政转向金融方面的设想，必然或至少要缩小甚至废除国家对价格的统制以及其它的直接统制。不难理解，作为对将来的期望的一种姿态，道奇总要表示希望推行自由经济。然而作为当时的实际问题来看，道奇究竟打算把经济统制撤消到什么程度，态度尚不明朗。实际上，由于大大削减了价格的补差，物价已大幅度地上升了。生产虽然回升，但在道奇路线下的国内购买力却急剧降低，道奇本来企图压缩国内需求以增加出口，但出口却意外地不振，致使生产严重过剩。自由价格与黑市价格大幅度下降，政府牌价与黑市牌价之间的差距全面地迅速接近起来，物资的供求关系又趋于缓和。生产资料与消费物资的配给以及价格的统制等等，从1949年4月起便大幅度撤消或被调整，一系列的专卖机构，有一部分被改组，大部分被解散了。

从1949年到1950年间，以极快的步伐废止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统制。朝鲜战争爆发后，以战略物资为主的各种物资，一度出现世界性的短缺，于是总司令部和道奇又不得不部分地恢复经济统制。尽管如此，废除统制的方向仍然没有发生重大变更。因此到1951年年中，除主食价格和主食分配还由国家直接统制外，其它的直接经济统制已被全部废除。

以道奇路线为开端的“排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恢复自由经济的本来面貌”——所谓价格机制的恢复有了急剧的进展。中小企业，最初对“撤消统制”的做法抱有最朴素的期望。因为经过长时期的战时和战后的国家统制，它们都成了大资本和垄断利益的牺牲品，故对撤消统制寄予很大希望。然而实际上，撤消统制根本没

有给中小企业带来任何好处，不仅如此，由于竞争激化等原因，反而使拥有强大力量的垄断资本，愈发加强了对中小企业的统治地位。实际上，废除统制和实行道奇路线的结果，中小企业受到了大规模的排挤，因而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垄断资本与中小企业的差距绝对地扩大了。

从形式上看，除极少数例外，国家对经济的直接统制已全部废止。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对经济失去控制，恰恰相反，国家对主食的直接统制，以及通过增减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控制经济的现象，至今仍然顽固地保存着。此外，当时国家对贸易和外汇的管理虽已大幅度缩小，但也没有完全废止，而且政府日益重视通过通货管理和财政制度来实现国家对经济的统制。

### 5. 在道奇路线袭击下的工人阶级

如上所述，“九项原则”的目的和本质在于压制共产党和活跃的工人运动，在于谋求劳资协调和加强资本家的地位。故在“九项原则”公布的次日，总司令部的劳动处长便露骨地劝告各个单位，停止年末的罢工活动。

社会党认为“九项原则”从来就是它的方针；共产党则认为“九项原则”是复兴日本经济的基本原则，问题在于由谁并为谁来推行这些原则。两党都完全赞成“九项原则”，并认为日本政府有忠实执行美国政府提出的这些原则的义务。工会对这九项原则也未表示反对。因此在“九项原则”基础上形成的道奇路线，便开始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攻势，特别是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系统的工会或工会活动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就使斗争落后而一再受挫的工会运动，又陷入了预料之外的困境和混乱。反对共产党上层领导的民主同盟派（简称“民同派”）的工会干部和社会党，为了削弱共产党的势力，不惜一切地破坏工人团结。为了这个目的，政府和自民

党对“民同派”所领导的政府机关及公共团体职工要求提高工资等等，也表示了让步和协助，从而大大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对抗力量。

在这种状况下，道奇路线从1949年初期开始便对劳动人民展开了进攻。首先是扩大裁减人员，迟付或少付工资，进入2、3月时，这种状况进一步扩大，并且从中小企业波及大企业。4月以后，开始执行道奇的超平衡预算，于是与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有关的部门，都大量地裁减人员，裁减的幅度分别为30%和20%。从7月开始，以国营铁道为首的政府部门，又大规模地裁减人员，进行“行政整顿”。私人企业的人员裁减也以7月为高峰，达到了惊人的大规模。1949年中，被裁减的人员虽然没有准确的数字，但估计公务人员有二十万人，私人企业约八十万人，总计近一百万人。在此次人员裁减中，首当其冲的是工会组织的活动分子。

如此大规模地裁减人员，当然要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抗，这种斗争在初期是相当激烈和广泛的。但是当7月以国营铁道工人为中心的工人斗争处于高潮时，发生了下山事件；接着是三鹰事件；8月又发生了松川事件。这三大事件的发生都与国营铁道有关，因而被宣传为共产党和左翼工会的阴谋，这种宣传的目的是想使左翼势力陷入困难境地。不管怎么说，这一连串奇怪事件对国营铁道工会的斗争起到了打击的作用，而且以此为开端，即从7月以后，工人斗争进入了低潮，“民同”系统陆续地脱离了各工业部门的工会组织以及全国工会同盟等左翼组织，于是战后在日本工人运动中居绝对优势地位的左翼系统丧失了主导权。从1949年秋季开始，这个主导权便为“民同”系统所控制。在工会运动中共产党的势力急剧下降以及工人阶级斗争的后退，这正是“九项原则”下道奇路线的最大目的之一，而这个目的，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办法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实现。但是工人阶级绝不是简单地后退了，他们对残酷地牺牲工人利益的道奇路线进行了反抗，通过1949



年年末要求发放年终奖金和1950年的“三月攻势”，这场斗争取得了广泛的开展。此外，要求大幅度修改道奇路线的“民同派”的各种势力也联合起来，为成立总评准备了条件。

道奇路线制造了庞大的失业队伍，总的说来就业人数大量减少，在中小企业中减得最多。经过斗争，一般地说，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多少有所提高，但是由于企业筹措资金困难而不能进行设备投资，完全靠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来维持生产。如果将劳动强度考虑在内，实际工资并没有增加，加上失业人数激增，更谈不到实际工资的增加。

## 6. 战后初期的农业

这里再简单地介绍一下当时的农业情况。

日本农业由于长期战争的关系，土地已经荒废，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农业的生产力极端低下。而且由于战败，当时农村拥有数量相当庞大的离职人员、由海外撤退的人员以及战时疏散在农村的人员。因此农村人口急剧扩大，农户增多，特别是小农户激增。日本的农村耕地面积在1931年为五百八十万公顷，1946年减少到五百万公顷，1950年大约仍是这个数字。农户总数从战前昭和初期到战时中期大约有五百四十万到五百五十万户，战后的1947年增加到五百九十万户，1949年更增加到六百二十四万户，为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战后初期农户手中都有粮食，所以当时苦于极端缺粮和黑市价格高涨的城市居民，对农户有反感。但是对农民来说，不管表面上如何，实际上生产已趋于缩小，加以国家强行低价征购大米以及租税负担等等，大部分农民的生活还是相当艰苦的，不少农民不得不依靠黑市收入和进城做工来维持生活，这也是实际状况。

1946年决定进行第二次农地改革，这是日本资本主义制度下

相当大的变革。这场改革，以占领军的力量为背景，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迅速取得进展。从1947年3月开始的一年当中，政府顺利地收买了地主的土地，在1948年里又顺利地将这些土地卖给了农民。到1950年为止，被解放的农地约达一百九十五万公顷，基本上实现了解放农地二百万公顷的目标，近80%的佃耕面积得到了解放。因此第二次农地改革，在这一年里，实际上以很好的成绩告终。此次农地改革的效果虽然不可能立即表现出来，但由于废止了高额的地租，特别是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在短短的数年之内，生产和收入以及农业投资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这就为农民提高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此次农地改革虽然使寄生的地主制度解体，为农民提供了土地，但是当局并未打算进一步从根本上解放在农民中占多数的小农户，也不想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来进行这场斗争。所以此次农地改革虽然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但还是把农民限制在小生产者的范围内，扩大生产也只限于个体农户所经营的范围。农地改革原则上是将拥有三町<sup>①</sup>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加以分割，使农业的生产单位化小。但是后来当日本的生产力在非农业部门取得很大发展时，这种分散的农户便成了农村经济广泛分化的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寄生地主制度的解体，农民运动失去了过去斗争的主要对象，加之农民小私有者意识增强，因而农民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但是为了推进以恢复经济为目标的重点生产，尤其是为了在短期内实现资本的迅速积累，资本家要求工人拿最低的工资，政府极力压低了主食的征购价格。劳动群众的购买力极低，也为进口粮食增加了压力。因此在农业生产还没有充分恢复起来的时

---

<sup>①</sup> 町，日本土地面积单位，一町约合一公顷，即九千九百十八平方公尺。——译者

候，从1948年春季开始就提早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倾向，农产品价格开始下降，农村经济形势恶化。进入1949年后，由于道奇路线下的大幅度增税和消费能力的急剧减退，上述生产过剩的倾向又进一步突出起来。因此1948年以来，由于重税和过多的征购等原因，各地甚至出现“放弃耕种”的情况，到1949年这种情况又有进一步的发展。